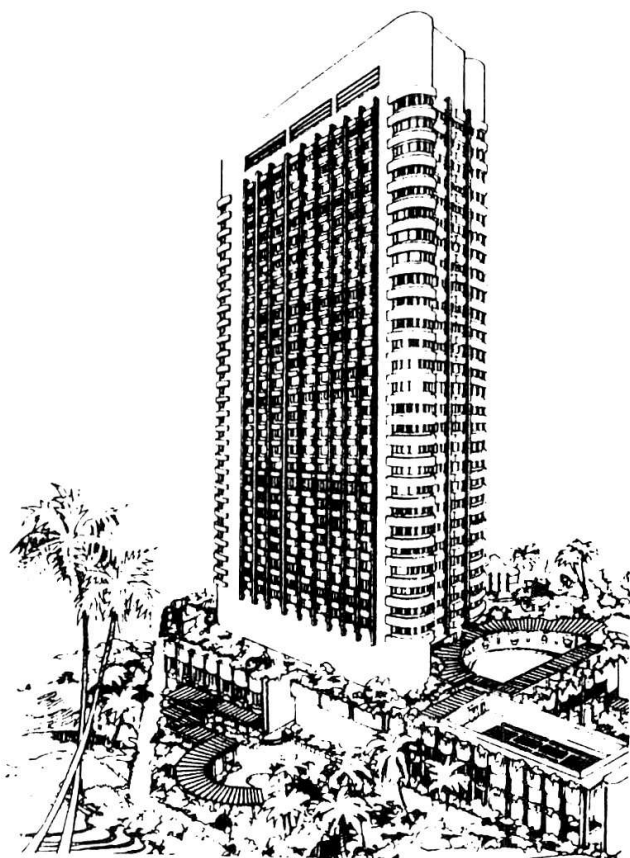


從中國經濟改革看

「理論與實際」



溫順天著
林瑞琪譯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八日的早上，相信很多香港人都會因看到一個難以置信的報章標題而驚詫得弄翻了早餐，當天《南華早報》中一篇報導的標題是：「中國宣佈馬克思主義經已過時。」然則，中國究竟會否真正地放棄這個推動革命、給予歷代共幹靈感及促成新中國成立的思想體系呢？

觸發這次海外傳播媒介廣泛注意的事件來源，始於早一天《人民日報》上一篇題名「理論與實際」，由署名「本報評論員」執筆的一篇文章。文中有些段落十分引人注目：

馬克思逝世已經一百零一年了。他的著作是一百多年前寫的，有的是

當時的設想，後來情況起了很大的變化，有的設想不一定妥當。很多事情，馬克思、恩格斯沒有經歷過，列寧也沒有經歷過，他們沒有接觸到。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的問題……（我們）對馬克思主義不能採取教條主義的態度，時代在發展，新情況、新問題層出不窮，用馬列著作的某些論斷來框住豐富的現實生活，只能阻礙歷史前進。我們這些馬克思的後代有義務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註一）
次日，（十二月八日），《人民日報》



我們這些馬克思的後代，有義務在實踐中豐富和發展馬克思主義。

頭版右下角又出現了一項補正，在上述引文中加了一個字眼，使到這句子成爲：「不能要求馬克思、列寧當時的著作解決我們當前所有的問題。」

說中國正在揚棄馬克思主義也許言之過早，但近期幾篇有關經濟的文章，確曾使外間的觀察家摸不清中國所要實行的經濟體系方向。這些文章散見於一九八四年的兩個月之中。毫無疑問，這是八四年十月二十日中國共產黨十二屆三中全會「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所帶來的結果。

上述摘自十二月七日《人民日報》的一段文章，必須放在對上述「決定」的探討及因落實「決定」而引發出的問題的脈絡中來研究。「決定」指出經濟改革乃中國當前急務，改革是爲了建立充滿生機的社會主義經

濟體制。它指出：「社會主義的根本任務，就是發展社會生產力，就是要使社會財富越來越多地湧現出來，不斷地滿足人民日益增長的物質和文化需要。社會主義要消滅貧窮，不能把貧窮當作社會主義。」（註二）

「決定」呼籲增強中國企業的活力（據報超過一百多萬的企業機構當中擁有職工總數高達八千萬），所賴的方法就是應用中國商品價格規律，建立一套計劃體系。「決定」稱「歷史的經驗也告訴我們，社會主義的計劃體制，應該是統一性同靈活性相結合的體制……必須大力發展商品生產和商品交換……突破把計劃經濟同商品經濟對立起來的傳統觀念……就總體說，我國實行的是計劃經濟，即有計劃的商品經濟，而不是那種完全由市場調節的市場經濟。」（註三）

經濟改革的基礎，是價格體系的轉變。「決定」宣稱：「我國現行的價格體系，存在着相當紊亂的現象，不少商品的價格既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係……價格體系的改革是整個經濟體制改革成敗的關鍵。」（註四）「決定」強調應把企業功能與政府分開，好使政府機構能正確地發揮管理經濟的職能。企業之間的競爭亦成爲可接受的事：

長期以來，人們往往把競爭看成是資本主義特有的現象，其實，只要有商品生產，就必然有競爭。在公有制基礎上，在國家計劃和法令的管理下，在爲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服務的前提下，讓企業在市場上直接接受廣大消費者的評判和檢驗，優勝劣汰。這樣做，有利於打破阻碍生產發展的封鎖和壟斷。（註五）

「決定」中另有一段文字呼籲建立多種形式的經濟責任制，貫徹按勞分配原則。這表示工作是採合同制，企業的經理在領導企業上負責。而同時，「決定」亦呼籲分擔責任。工會組織和職工代表在審議及討論重大問題的決策上扮演一定的角色，以體現一個民主管理體制。（註六）腦力勞動者的工資必須提高，「決定」承認，在目前這方面的工資實屬偏低。

接著，「決定」又談及消費品分配的問題。文件中說：

長期以來在消費資料的分配問題上存在一種誤解，似乎社會主義就是要平均……這種平均主義思想，同馬克思主義關於社會主義的科學觀點是完全不相容的。歷史的教訓告

訴我們：平均主義思想是貫徹執行按勞分配原則的一個嚴重障礙，平均主義的泛濫必然破壞社會生產力……共同富裕決不等於也不可能是完全平均，決不等於也不可能是所有社會成員在同一時間以同等速度富裕起來……這樣勢必導致共同貧窮……由於一部份人先富起來產生的差別，是全體社會成員在共同富裕道路上有先有後，有快有慢的差別。（註七）

推動多種不同形式的企業的努力都獲得鼓勵，包括個體戶，以及較傳統的經營形式和集體企業。「決定」宣稱：「我國現在的個體經濟是和社會主義公有制相聯繫的……它對於發展社會生產，方便人民生活、擴大勞動就業具有不可替代的作用。」（註八）「決定」亦同樣鼓勵吸引及擴大外國投資。

「決定」亦呼籲起用和培養青年及中年管理人才，以接掌經濟企業的領導工作，基於這個原因，「決定」堅決糾正現存歧視知識份子的狀況。毫無疑問，落實「決定」時，困難和阻力是可以預見的。「決定」曾這樣聲明：「不要在幹部和群眾中分甚麼『改革派』、『保守派』，要相信思想上一時跟不上形勢的同志會在改革的實踐中提高認識。」（註九）

因此，當香港人正因這篇文章而大吃一驚的時候，我們可以想像到很多老黨員亦會同樣的感到詫異。特別是當他們讀到「決定」中所鼓勵的企業間競爭以及平均主義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不相符時，他們的信念大爲受損。他們會問：究竟是否要放棄社會主義道路而成爲資本主義者？無疑，有些黨員會產

生懷疑，究竟如何可以將「決定」的指示與四個堅持結合起來？這四個今日每個中國公民都必須尊奉的原則是：社會主義道路、無產階級專政、共產黨的領導和馬列毛思想。

因此，爲了平息一些黨員的恐懼及說服一些抱殘守缺者，使他們明白到「決定」中所提出的原則，與馬克思社會主義並不衝突，最近的中國報章出現了一連串的文章，解釋中國社會主義的最新發展。「理論與實際」是其中的一篇。

環繞著這同一問題，而比「決定」早一星期面世的，是八四年十月十二日馬列毛思想研究所主任蘇紹智所寫評論列寧全集第二版的文章。蘇氏寫道：

他（列寧）在自己的著作及演講中多次提到「我犯了一個錯誤」，「我覺得對不起俄國工人」……列寧成功的秘訣集中到一點，就是：從實際出發，創造性地運用馬克思主義。他一生信守不渝的箴言就是：「馬克思主義不是教條，而是行動的指南。」（註十）

蘇氏認爲，由於列寧死得太早，他的靈活運用馬克思主義的概念並未曾在蘇聯落實執行。按蘇氏的看法，史太林僵化了馬克思主義，這不僅對蘇聯產生了嚴重的影響，而且亦影響了國際共產主義運動。

稍後，在十一月末，一連串以「本報評論員」署名的文章陸續在《人民日報》出現。據報這系列的文章取材自黨總書記胡耀邦對負責宣傳工作的地方幹部的講話。（註十一）第一篇文章題名「改變舊觀念」。文章作者質詢那些不願追隨時代改變的領導人，是否受舊觀念及舊方法的羈絆：

觀念陳舊的人，往往是脫離實際的

人。現實生活每日每時都在發生着變化，出現了許多新情況、提出了許多新問題……改變舊觀念，光坐在辦公室裏不行，要下去，要到創造新生活的群眾中去，到不斷發展變化的現實中去，使理論和實際相結合……讓事實說話，使人們在實踐中提高認識。（註十二）

第二篇評論出現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五日，題目是：「局部與整體」。文章探討各個地區、各個部門與整體之間的關係，以及彼此間如何互相依存。該報評論員強調各個部門的活動必須與整體的活動協調一致。文章這樣寫：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來，這六年，整體起了根本性質的變化。六年前，全黨「以階級鬥爭爲綱」。階級鬥爭爲綱，在黨內已經形成一種習慣勢力，這個影響千萬不要低估，特別是思想戰綫的同志，千萬不要低估「左」的影響。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後，我們廢除「以階級鬥爭爲綱」，把重點轉移到社會主義現代化建設上來……爲實現四個現代化服務，要用這個標準來檢驗我們的工作……長期以來；我們把政治與經濟割裂開來，突出政治……現在，把經濟和政治分開來的時代結束了。搞四化就是最大的政治。（註十三）

接着，就是這篇引人觸目的「理論與實際」。作者向讀者指出要想懂得實際，就要投身到實際中去。（註十四）

八四年十二月十三日，《人民日報》轉載了一篇早一日前刊登在《解放軍報》的文

章，名為「黨的紀律不能『鬆綁』」。有些海外觀察家起初認為，這是一項明顯的暗示，要求經濟改革剎車。但實際上，該文却是支持改革，它指出給經濟企業鬆綁與給黨的紀律鬆綁不同，前者是要衝破那些阻碍生產力發展的束縛，而黨紀則是維護全黨集中統一，貫徹執行黨的路綫、方針、政策、實現黨的綱領和任務的重要保證。文章中又繼續提出，「歷史上有一個前因」：

由於一九五七年以後，黨的指導思想上的「左」傾錯誤的影響，把搞活企業和發展社會主義商品經濟的種種正確措施當成「資本主義」，結果使經濟體制上過度集中統一的問題長期得不到解決，使本來應該生機盎然的社會主義經濟在很大程度上失去了活力。當今天黨中央決定對經濟體制進行全面改革，給企業放權、「鬆綁」的時候，這些同志就誤以為政策上給企業放權、「鬆綁」，黨的紀律也應當放寬、「鬆綁」。應當懂得，黨的政策是黨中央根據形勢和任務而制定的，它的具體內容在不同時期是會發生變化的……在當前，堅決貫徹執行黨中央關於改革的方針政策，就是遵守黨的紀律；違反這些方針政策，就是違犯黨的紀律。（註十五）

《人民日報》評論員在十二月十八日再執筆談論領導與被領導之間的關係。他籲請領導人「要經常調查了解下面有甚麼先進的、新鮮的經驗，有甚麼突出的問題。這些，都要深入實際，深入群眾，要善於向被領導者學習、請教。這幾年農業改革收效顯著，不就是領導機關認真考察和總結了下面幹部

群眾創造的聯產承包責任制，然後加以推廣的結果嗎？」（註十六）

十二月二十一日，《人民日報》評論員以「再談理論與實際」為題，繼續發揮。他重申在十二月七日一文中所發表的觀點，指出不能把馬克思列寧主義當作包醫百病的「靈丹聖藥」，並強調馬克思、列寧都未接觸過中國革命的實際情況。毛澤東根據中國的情況，領導人民建立革命根據地，用農村包圍城市，最後奪取了政權。評論員又指出，同樣，馬克思曾經設想在社會主義條件下，不需要商品和貨幣，但我國社會主義建設實踐證明，社會主義社會不能沒有商品和貨幣。此外，文章總結在貫徹執行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時，「我們必須到現實生活中去，學會運用馬克思主義的立場、觀點、方法，分析和解決現代化建設中出現的新情況、新問題，總結新的經驗，並把它上升到理論，豐富馬克思主義的理論寶庫。」（註十七）

《人民日報》評論員在新一年來臨後，繼續發表他的倡議。在八五年一月五日的《人民日報》上，他鼓吹重新建立城鄉之間的經濟關係，認為兩者是互相依存的。該報評論員強調，結合兩者的發展，可以使城鄉二者都同樣繁榮。作者鼓勵城鄉之間的技術、人力、商品自由互相交流。（註十八）

《人民日報》一篇紀念遵義會議五十周年的社論，亦涉及經濟改革的問題。文章這樣說：「『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突破了我們過去在『左』的思想影響下形成的有關社會主義的一些舊的觀念和認識，使馬克思主義的普遍真理同中國經濟建設的具體實踐更好地結合起來。」（註十九）

自元旦起，「決定」開始逐步落實，八

五年一月八日《人民日報》頭版刊登了經濟學家田紀雲的一篇文章，呼籲搞好價格體系的改革。田氏指出，不少商品的價格不反映價值，也不反映供求關係。他表示，從今開始，商品價格可按供求關係而調節，亦容許商品價格環繞著商品的實值來波動。（註二十）

在回答外國訪客及記者所問及關於中國是否放棄馬克思主義及社會主義時，中國領導人趕緊否認其事。八四年十二月中，趙紫陽總理對到訪的蘇丹總統尼邁里說：「中國是一個社會主義國家，今後仍將堅定不移地堅持社會主義制度，但社會主義不建立在生產力發展的基礎上，則只能是一句空話。」（註二十一）而十二月底，黨理論家于光遠則向外國記者表示無法在馬克思的著作中，找到具體計劃的清晰意念，他說：「計劃的理論是留待我們去發明和創造。」（註二十二）于光遠列舉匈牙利共產主義制度為例，將基本的社會主義制度與為求達成這制度所用的工具分別開來。他續稱，在每一個時代，不同的工具會用在不同的國家上，但目標始終是建設社會主義。

元旦伊始，鄧小平所著的《建設有中國特色的社會主義》一書面世。這本書收錄了他自從一九八二年以來的二十二篇講話。他這些講話的重點是說明中國會維持社會主義，但亦表示「一點點資本主義對我們並沒有害。」（註二十三）《光明日報》亦於元旦日以頭版一篇評論探討這問題，它指出一九二二年列寧在蘇聯所推行的社會主義模式是一個「戰時經濟」。文章聲稱，這模式並不適用於當前中國的和平時期經濟。（註二十四）數日後，中共中央委員會從事研究工作

的林子力對記者表示，馬克思並不完全了解社會主義的現實，因為他著述時還未有任何社會主義國家出現。（註二十五）稍後，七位曾參加遵義會議而至今尚存者之一的楊尚昆，在遵義會議五十週年紀念會上，把最近中國摒棄蘇式經濟模式，比擬為一九三五年遵義會議中國共產黨摒棄極左冒進路綫的決定。（註二十六）

對於近期這些有關中國社會主義制度及經濟改革的需要的爭論，我們應怎樣去理解呢？在當前，有三個問題是不得不提出的。第一，這些評論是針對甚麼人而發的？其次，中國究竟是否真正放棄社會主義制度？第三，經濟改革會否成功？

鄧小平曾在一次講話中解答這些問題。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在黨中央顧問委員會所發表的一篇講話中（一九八五年元旦日才公佈），鄧小平毫不懷疑地相信經濟改革會成功。他表示中國人民的生產值會在二十世紀結束前翻兩番，而其後再過三十至五十年，中國的生活水平會趕得上世界其他地方。談及即將簽署中英關於香港前途協議（一九八四年十二月十九日）時，鄧小平為了消除香港市民對九七以後生活水平的憂慮，曾表示：「香港的制度會維持五十年不變；五十年之後我們的生活水平就會和他們的十分接近了。」（註二十七）由此，我們可以看到經濟改革的原因之一，是為了有助於統一全國，首先是香港，然後是台灣。鄧小平深信，中國人民會支持改革，因為改革有利於他們。鄧總結說：「要是有人問我如何將經濟改革配合上四個堅持上，我會說：這是真正的社會主義。」



中國人民會支持改革，因為改革對他們有利。

長期擔任黨理論工作的胡喬木及鄧力群等人未有出席八五年一月初的全國作家協會會議，正顯示出理論與實際這一系列的評論，乃針對國內一些「老當家」而發的。輿論公認這兩人是負責策動去年反精神污染的短暫運動。大家當還記得去年胡喬木寫了一篇長文，題為「關於人道主義和異化問題」，文中他認為馬克思主義中根本不存在人道主義和異化。《人民日報》的兩位編輯胡績偉及王若水，則主張馬克思主義中含有人道主義思想，他倆在爭論中離職。但胡喬木現在又不得勢了，因為鄧小平之子鄧樸方最近寫了一篇文章，強調共產主義內的人道主義。該文刊於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七日的《人民日報》上，與「理論與實際」一文同時刊出。（註二十八）

作協會議上，中共中央書記處書記之一的余秋里，曾向與會作家保證今後創作自由，作家不會再成為政治運動的對象。八四年十二月三十日的《光明日報》報導：「自發的掌聲共有三十三次，最長的一次達一分多鐘。作家們保持着高昂的情緒。」（註二十九）作協書記處書記王蒙聲稱：「中國社會主義文學的黃金時代到來了。」（註三十）

事實上，當前的國家確表現出「情緒高昂」。在最近一次往訪中國兩個都市的行程中（「因此我所談及的僅限於這兩個城市」），筆者發現市民一般都對生活感到滿意、穿得不錯、吃得不錯。起碼在有足夠衣物去抵禦北京凜冽的寒風。新建設處處可見，例如：在北京有中國國際信託及投資公司大廈，樓高二十九層，是首都最高的建築物。一

名的士司機告訴我們，他每月可賺超過二百元人民幣，連同他的太太所賺的六十元，每月可有七十至八十塊人民幣存入銀行戶口。一位年青知識份子告訴我們現行的政策是：「對外開放，對內搞活。」我們在賓館的餐廳中見到飲宴連連，賓客們開懷談笑祝酒。很多中國人在國內到處旅遊，甚至跨出國外遠遊香港呢。

至於經濟改革可能產生怎樣的難題？讀者如果想讀專家的意見，請參考《鼎》第二十四期顧汝德所著「中國經濟改革——爭論的原因」。

新的開放方針在經濟領域內帶來的問題之一是經濟罪行的增加。甚至黨員中亦不乏害群之馬。其中一個例子就是成立企業公司，直接從工廠購入廉價產品，再以高價轉售出去，而獲取鉅額盈利。不過，種種跡象都顯示出政府已注意到經濟罪行的問題，並已著手粉碎這些犯罪活動。

需要當心的是，人民之間的貧富差距不可以太大。據聞有些人將最好的水果、蔬菜

，以至鮮美的肉類都往自由市場送去，以求產品能掛出更高的價錢。正常的市場反倒只能有產質較差的東西供應。窮苦大眾會因為受不了「自由市場」貨品的漲價。而起反感「關於經濟體制改革的決定」曾指出共產主義不等於平均主義；究竟這種說法能不能令這些人民感到滿意呢？

筆者尚有一個問題，涉及那些在中國被判為反對社會主義制度（反革命份子）而入獄的人士，其中包括一些宗教人士。既然中國社會主義制度是在改變中，則因舊制度而受刑的人可否獲得重新審理呢？這些昔日遭人譴責之處，如今可能是被認可的。在眾多有關經濟改革文章中，筆者至今仍未讀到任何有關這一點上的談論。

經濟改革是中國近六年來所推行的四化的最新步伐。相信中國領導人及老百姓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仍會團結一致，努力達成這個目標，而中國友好亦預祝他們成功。（附註見本刊今期頁 。）



有些人將最好的產品，送往自由市場去，以求賣得更好的價錢。